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样态、控制机理及其 规制方向

陈金晓,陈靖元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州 350100)

摘要: 数字技术与数字资本的结合,构成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特征。资本通过数字技术操纵时间,使其对劳动力的剥削更具有迷惑性与隐蔽性,从而扩大了剥削的手段与范围。数字资本通过对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全面控制,实现了对人的操纵,而数字技术的普遍发展使得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活动的数据皆可被算法收集、预测和控制。数字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中立性与客观性,在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时消失殆尽。为了实现数字技术的价值复归,必须纠正其偏离正轨的发展,关键在于使其脱离数字资本无限扩张的野蛮逻辑,实现数字技术的共商共建共享,以推动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数字资本主义;数字资本;数据商品;社会再生产;数字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F014;F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5)04-0207-09

The exploitative pattern, control mechanism and regulatory direction of digital capitalism society

CHEN Jinxiao, CHEN Jingyuan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capital constitutes the prominent feature of digital capitalist society. Capital manipulates time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making its exploitation of people more deceptive and covert, thus expanding the ways and scope of capital exploitation. Digital capital achieves manipulation of people by controlling the entire chain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the widesprea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llows data from social production, exchange,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activities to be collected, predicted, and controlled by algorithms. The neutrality and objectivity inherent in digital technology disappear when it is combined with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realize the value retur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 its misplaced growth direction, and the key lies in liberating it from the barbaric logic of unlimited expansion of digital capital, achieving co-consultation,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git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 words: digital capitalism; digital capital; data commodity; social reproduction; digit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随着数字产品与数字服务的全方位渗透,数字化生存构成人们新的生存状态,数字实践成为人们

实践活动的新场域。从世界范围看,数字技术正在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

收稿日期:2024-07-09 网络出版日期:2024-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2CKS036);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FJ2023X008)

作者简介:陈金晓(1996—),女,河南南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的研究。

面面,对当前社会的生产模式、生产关系等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1999年美国学者席勒首次明确提出数字资本主义概念:“所谓数字资本主义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1]面对新发展形势,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正确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解析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双重蕴意,是社会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当前,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把握。从宏观层面来看,学者们聚焦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整体架构,分析社会的新变化,并探讨这些变化中的矛盾表现形态,总结其发展新特征,同时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模式进行深入研究。例如,闫培宇^[2]梳理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认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加剧了资本的过度积累,引发了数字化劳动异化和数字霸权等问题。夏巍等^[3]则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三重异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从微观层面来看,学者们更倾向于选择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定领域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对数字平台、数字劳动等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其本质并进行批判性思考。蓝江^[4]认为数字平台重写了数字时代的生存方式,分析了数据向数字资本转化的过程,并进一步考察了平台资本主义下的数字生态。李巧巧^[5]则研究了数字劳动中存在的技术控制与资本剥削机制,并尝试探索如何规范数字技术、克服数字劳动异化的具体途径。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已经构建了一个宏观与微观相互补充的基本框架。然而,深入分析这些研究可以发现,从宏观角度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探讨大多忽视了对社会中具体研究对象的深入考察,导致理论论证显得较为抽象;而微观视角的研究则往往局限于具体问题的分析,缺乏将这些问题放在资本主义新发展模式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量。这导致宏观与微观研究之间虽有相互补充,但未能形成系统性和条理性的有效连接。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是相辅相成的。从宏观层面把握问题的基本框架和核心立场,从微观层面进行深入挖掘和具体拓展,实现这两个维度的有机融合,才能更深入地理解问题。基于此,本文从宏观上审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模式,分析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控制与剥削,并从理论上进行审视与剖析;在微观层面,关注数字资本对社会再生产活动的

制约,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部性质变化,力求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探索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现实路径。

一、剥削样态: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境况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拓展和深入,传统的劳动模式发生了改变,社会生产关系也得以调整。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发展样态,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景象,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便是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合。这种结合在推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透过纷繁复杂的问题表象可以看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样态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在资本统治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使人们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反而带来了控制的加剧与剥削的深化。

(一)数据成为商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以实物为基础,如铁、小麦等,这些商品具有突出的物质性特征。然而,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产业结构相较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发生了显著变化,商品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并逐渐展现出非物质化的趋势。在数字技术广泛发展的背景下,数据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商品之一。

数据之所以能够成为商品,与数字平台有着紧密的联系。当前,数字平台正在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变革,数字技术通过数字平台作用于人类,促使原来依赖物质性身体存在的传统交往模式转变为在线模式。也正因如此,数字资本主义又被称为“平台资本主义”^[6]。数字平台的用户创造了大量原始数据,然而,就原始数据本身来说,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商品。因为未经处理的原始数据规模庞大且杂乱无章,其自身蕴含的使用价值无法直接被人们所利用。这就如同深埋于地下的原油,必须经过工人的冶炼和加工,才能转化为各种有用的物品,并应用于生活的不同领域。平台用户创造的原始数据也必须经过专门从事数字劳动的劳动者进行处理加工,才能成为真正有用且有价值的数据,最终成为商品。数据商品与一般商品一样,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数据商品的使用价值主要是指其自身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求的特性。随着信息技术与数字平台的不断完善,原始数据的数量持续增长,对数据商品进行分析处理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数据商品的使用价值愈发显著。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医疗、金

融、消费等各个方面的数据都已实现商品化,成为市场交易的对象。像 Google 等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早已开展数据经纪服务业务,使数据交易活动常态化。

数据商品的价值根源于其中凝结的无差别人类劳动。作为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数据商品,其完整的生产链条涵盖了数据的生成和数据处理两个阶段。在数据生成阶段,劳动体现在人们通过数字设备在生产和生活中进行的各种数字互动,这些活动虽然往往不被劳动者所察觉,但实际上消耗了人们的智力、体力和时间。而在数据处理阶段,劳动则主要指数字劳动者的专业工作,即数字企业雇佣的员工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的过程。无论是数据的初始产生还是随后的信息处理,都涉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投入,这些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构成了数据商品能够被交换的基础。

(二)科技与资本结合

数字资本主义乃是资本与科技相融合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曾就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联展开深入探讨,他明确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 and 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7]在先后历经产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之后,资本主义迈入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崭新时期,达成了科技与资本的共谋。二者的结合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发展的路径,重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模式以及生产关系。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科学技术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人们的思维惯例中,“但凡一个事物以科技创造和科技进步的名义出现,它通常就会被视为真理般的存在,很多人认为它是不能被批判的东西,因为在科技的话语体系中,科技进步几乎等同于人类的未来和幸福。”^[8]数字资本正是利用这种思维惯性,公然以科技进步为名,行掠夺之实,声称其目标是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的进步与自由做出伟大贡献。从工具属性来看,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科技本身具有某种中立性和客观性,可以被任何人所利用。然而,科技是由人创造和使用的,而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阶级分化、财富差距等因素决定了特定的科学技术不可能被所有人平等掌握和使用,而只能成为为特定群体服务的工具。换言之,当科技与资本合谋时,科技往往会丧失其原有的中立性和客观性。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在科技的掩护之下,

在更大的范围里实现了对人们的剥削与控制。首先,数字资本常常打着科技进步的旗号,极具迷惑性。近些年来,人工智能、物联网、元宇宙等崭新技术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公开宣扬的理念无不是为人类缔造美好生活。诚然,科学技术的运用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潜藏在其背后的资本所蕴含的剥削逻辑,辨析其发展的真正内涵。资本增殖的逻辑已然决定了资本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投入是有原因的,其根本目的绝不可能是为普通劳动者创造美好生活,而仅仅是开辟新的资本掠夺场所、发掘新的资本增殖空间的一种尝试。资本公开宣扬的理念是为遭受剥削与压迫的人们量身定制的,在竭力获取更多剩余劳动的同时为劳动者编织美梦,让人们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之中,从而降低人们对剥削现状的反思与反抗。

其次,科学技术的进步扩展了资本剥削的手段。在传统的产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模式和资本剥削的方式相对简单和固定。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得益于科学技术的推动,生产模式变得更加复杂,资本剥削的方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和隐蔽。互联网信息技术和电子支付方式的普及改变了传统商业模式,扩展了劳动形态,浏览网页、在线购物、网络社交等活动构成了数字劳动的新形式。与专职从事数字劳动的工作者不同,平台用户所进行的这类劳动常常是无偿的。换句话说,使用各种数字平台的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为数字资本家提供无偿劳动的工作者。资本家利用多样化的信息技术,将数字劳动包装成娱乐化、休闲化的形式,使得资本剥削更具隐蔽性。

最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拓宽了资本剥削的范围。在传统产业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剥削通常受到地理空间的约束,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调整存在边界。然而,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元宇宙、增强现实(AR)等技术的创新,实体空间之外的虚拟空间被挖掘并逐步发展起来。新的虚拟空间的开拓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契机,同时也意味着资本扩张的领域范围得到更新,资本能够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攫取剩余价值。

(三)资本对时间的控制

对时间的控制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剥削与压迫的重要手段。马克思曾指出:“在一昼夜 24 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9]在传统产业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

时间来最大化地增加工人的剩余劳动。劳动者的休闲时间与工作时间相互对立,两者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网络通信等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模糊了工作与休闲的界限,不仅使人们的劳动突破了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而且使人们在各种数字平台上的社交、休闲活动也成为了资本增值的工具,以更隐蔽、更具欺骗性的方式控制人们的劳动时间。在探讨数字资本如何控制劳动时间的问题时,首先需要明确控制的目标。如前所述,除了一般受雇的数字劳动者外,还有从事无酬劳动的非雇佣数字劳动者,两者都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数字资本通过对不同类型劳动者特性的分析,制定相应的措施,以实现了对不同类型劳动者的有效控制。

其一,尽力延长雇佣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时长。以 Google 等知名科技公司为例,这些公司打着“员工至上”的旗号,在公司内部设立健身房、咖啡厅等休闲娱乐场所,营造出人性化、舒适化的工作氛围。从表面看,休闲娱乐场所的设置确实为员工提供了多元选择,但本质上,此类举措仍是尽力延长员工劳动时间的重要尝试。休闲娱乐场所的空间位置决定了员工的休闲活动只能在公司内部进行,这意味着使用此类场所的员工在规定工作时间外无法立即离开工作场所。在此情况下,一旦遇到突发且时效性强的工作内容,劳动者能在最短时间内返回工作岗位,便于资本家把控劳动者工作时间,变相延长了雇员的劳动时间。

此外,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打破了工作时间与工作场域的限制,无论劳动者何时何地,只要拥有特定数字设备即可进行劳动,使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更具灵活性。人们在看到科技进步带来的改变时,不能被其宣扬的“先进性”所迷惑,必须认识到,在其灵活工作机制背后深藏着剥削与压迫。看似灵活的工作机制背后实则是更为严苛的考核制度。依托数字技术的发展,资本家能够通过更智能、更精确的方式掌控数字劳动者的劳动状态,创造了“超级全景监狱”^[10]。资本家根据劳动数据的汇总与分析,不断更新对员工的考核标准,进一步增强了对数字劳动者的控制与剥削。

其次,对非雇佣数字劳动者的休闲娱乐时间的控制。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平台的广泛使用打破了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的传统时间结构,消除了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之间的明确界限。尤里安·库克里奇将这类非雇佣数字劳动者称为“玩工”^[11],包括在数字平台上进行娱乐休闲

活动及日常交往的数字用户。与一般数字劳动者相比,“玩工”群体规模庞大,覆盖面广,创造了大量数据,他们的在线活动时间全部被资本家转化为资本增值的剩余劳动时间,实现了劳动时间与娱乐时间的融合。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被数字技术所塑造。作为社会存在,人们常常以“虚拟人”的身份,通过数字设备的中介与他人交流,虚拟世界中的活动成为人类重要的社会交往形式。数字资本家正是通过控制虚拟世界来实现对现实世界中人的控制。数字技术创造了一个光彩夺目的视觉世界,加之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人们接收到的都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内容,导致平台用户沉迷于数字平台所呈现的虚拟场景,逐渐失去对时间流逝的感知。作为数字“虚体”的用户在平台上活动的时间越长,创造的数据信息就越多,而这些在虚拟空间中产生的全部数据信息归资本家所有。原始数据经过收集、提取和整理后被资本化,成为资本获取利润的资源 and 工具。而作为数据资源生产者的劳动者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只得到了玩弄与压迫。

此外,长期沉溺于虚拟空间也使人们处于现实与虚拟的割裂之中,面临部分能力退化的风险。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在海量信息的“投喂”和信息技术的控制下逐渐丧失批判性思维,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12]。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最终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在看到科技给生活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科技与特定生产关系相结合后,原本具有中立属性的科技便不再保持中立,转而成为特定阶级掠夺财富、维系统治的工具。科技与资本的共谋,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重要利器。数字技术的迅速更迭与广泛应用,重塑了传统的生产模式与生产关系,在塑造社会发展新风貌的同时,也将人与科技、价值剥削、新型资本形态等问题呈现在大众面前。

二、控制机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活动

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是维持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性活动,对社会生产活动的分析是全面把握一个社会基本发展状况的基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生产与再生

产活动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基本环节,并对四者间的本质联系进行了深入阐述,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论框架。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平台的广泛发展使得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活动都能被算法预测、收集和控制,展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要深刻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揭示其对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控制机制,把握其本质与未来发展趋势,就必须深入探究社会生产与再生生产活动的具体实践。

(一)社会再生产活动的运动过程

社会再生产过程涵盖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四个不同的环节。然而,这四者之间存在同一性,彼此相互衔接、相互影响,且缺一不可。马克思指出,生产乃是人类改造并开发自然资源以满足自身需求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制造出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对象;分配则决定了社会中不同的人获取劳动产品的比例,它往往受限于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被界定为从社会角度出发的要素;而交换是个人凭借自身拥有的产品去换取自己所需的其他特定产品的过程,其依据通常是个体的需要,被规定为从个体角度出发的要素。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的背景之下,“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13]694}换言之,劳动者自身的劳动产品自劳动过程结束之际就与劳动者相分离,必须通过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才能再次与劳动者产生联系。产品历经生产、分配、交换这三个环节后,最终进入消费环节。“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为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13]698}通过消费,商品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一方面,商品中所包含的预付资本和剩余价值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商品通过被消费完成了满足人的需要的使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生产视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起点,将消费看作其终点,而分配和交换则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四个环节在时间上依次继起,在空间上同时并存,共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完整过程。经济社会也正是在这四个环节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

(二)数字资本对生产活动的控制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活动进行深入研究,考察了物质生产活动顺利进行的过程及必备条件,指出生产要素必须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以及

使这两者结合的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其中,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统称为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整个劳动过程都受到资本家的控制,从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准备阶段,到在特定场所中实现两者结合的生产阶段,再到生产出的产品进入流通领域,整个过程都被资本所主导。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与技术相互勾结,致使资本操控物质生产过程的方式发生了一定转变,生产活动受到平台算法的严格控制。从生产准备阶段起,数字资本借助发达的信息技术,精准掌控所需的劳动力及生产资料,包括其数量与质量。首先,资本家利用信息技术能够精准调节各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使其达至最优状态,竭力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力求以最少的劳动力驱动最多的生产资料,通过减少可变资本的支出降低生产成本。其次,凭借发达的信息匹配技术,资本家能够在劳动者数据库中精确筛选出自己最为需要的劳动者,减少因劳动者技能不匹配而导致的资源与时间的浪费等情况。当进入具体生产过程时,资本家及其代言人又通过分析劳动者在劳动中的具体活动,为工序、工具以及工作量等制定统一标准,最大限度地提升劳动者的工作效率,使劳动者沦为机器上的零部件。而在产品生产完成准备进入市场之际,大数据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资本家可以掌握市场的最新动态,依据不同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及其他相关因素,对产品流通的范围及方式进行快速规划,以缩短资本流通时间。

(三)数字资本对交换活动的制约

就交换而言,它涉及个人用自己的产品换取所需其他特殊产品的过程,既包括生产准备阶段对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也包括生产完成后进入流通领域后,根据个体发展需求进行的产品交换。

从生产准备阶段来看,资本家之间以及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进行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交换是生产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其中劳动力商品的交换是整个交换活动中最为特殊的部分。劳动力商品的交换过程本身就具有欺骗性,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种欺骗性与隐蔽性更为显著。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在交换过程中同样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资本家作为货币的占有者与劳动力商品的占有者进行交换,双方在自由、自愿的原则下缔结契约。单从商品交换领域来看,这个过程似乎并无不妥,但一旦离开这个领域,就会发现,“我们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

后”^{[13]168},看似平等自愿的背后隐藏着极致的压迫与剥削。工资作为劳动力商品交换的中介,掩盖了交换活动的不平等性,且工资的本质规定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规制了劳动者的消费活动。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资本家借助新兴媒体大力宣扬劳动力商品交换的合理性与平等性,将“劳动创造财富”的理念灌输给广大劳动者,采用绩效考核等方式激发劳动者的竞争欲与积极性,激励劳动者不断完善自身劳动技能,使其更为匹配对应岗位的需求,最终使广大劳动者成为适配性更强、更为有力的资本增殖工具。

当产品进入市场后,个体根据发展需要进行的交换活动也同样受到数字资本的制约。从表面上看,个人的交换活动似乎是自由、自愿的,但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演进逻辑,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信息技术不断完善的背景下,资本家不仅可以通过各种数字平台向大众投放形式多样的广告,激发人们的购买欲,诱使消费行为的产生,而且能够根据市场反馈的各种数据,提前预测消费的未来趋向,并对其进行相应的引导。

(四)数字资本对分配活动的掌控

分配决定着社会中不同的人获取劳动产品的比例,其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配方式常常以法律的形式被固定下来,这保障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从制度层面固化了无产阶级的贫困状态。从劳动内容和劳动形式来看,新时代的数字劳动者看似与传统产业工人截然不同。然而,透过表象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未改变,特定的分配制度也依旧未变。数字劳动者与传统产业工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仍然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范畴。并且,由于受特定分配方式的限制,他们依旧处于贫困之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资本论》中从多角度对无产阶级的规定性进行阐明,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三个核心特征即不占有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处于贫困地位^[14],并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特定的分配制度源自特定的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性决定了分配制度的不公正性以及其中蕴含的剥削性。

随着社会的持续进步,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有所提升,部分劳动者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表面上看,传统意义上一无所有的自由无产阶级似乎已不复存在,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数字时

代的劳动者仍然属于马克思所描述的无产阶级范畴。首先,创造和处理数据的数字平台仍然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实际的生产者——劳动者依然无法占有生产资料;其次,在数字劳动中,广大劳动者仍旧依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最后,在数字贫困的新形态下,处于贫困状态的依然是普通劳动者。

阶级分化的客观现实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主导的特定分配方式所决定的。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资本家控制无产阶级的手段不断更新,维护资本主义特定分配制度的措施也变得更加有效,通过数字技术为劳动者描绘虚假而美好的未来,同时使“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深入人心,并鼓励劳动者通过更多的劳动换取能够带来“美好生活”的私有财产。当前社会的大多数劳动者确实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但数字资本增值的逻辑也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即使能够摆脱绝对贫困,也永远无法摆脱相对贫困的困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控制下,劳动者将永远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而在数字时代,他们所受到的压迫与剥削更为严重。

(五)数字资本对消费活动的干预

待出售的商品内在包含全部预付资本及新产生的剩余价值,属于已经增殖的资本的实物表现形式。作为资本的商品与一般商品相同,只有被卖掉方可成为真正的商品,并且只有顺利售出,商品中所包含的预付资本和剩余价值才能够得以实现。当商品被卖出后,商品资本重新转化为货币资本,如此循环往复,社会再生产过程才能够顺利进行,而资本也才能够实现持续不断地增殖。在此过程中,消费成为资本再循环的关键环节。这也就决定了无论在何时,资本都会对消费活动进行干预,尽力缩短商品流通时间。

在数字时代,信息技术的进步极大地增强了资本家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减少了市场盲目性所带来的损失,使得他们对大众消费活动的操纵更加得心应手。首先,资本通过无处不在、形式多样的数字平台进行广告宣传,利用美化的图片、视频等形式将商品以编码后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将消费与美好生活联系起来,激发人们的购买欲望。其次,通过对人们过往消费数据的分析来预测未来消费趋势,并据此进行产品布局。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为顾客提供个性化的消费内容,对客户群体进行细分并实施精准营销,将符合用户需求的商品精准推送给顾客。最后,算法通过复杂的计算规则推导出特定市场中特定产品的价格,并根据特定的定价算法

逻辑将消费者划分为高消费能力和低消费能力群体,根据其消费能力匹配相应价位的产品^[14]。表面上看,数字平台与消费者的双向互动提高了消费效率,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实际上却揭示了资本控制下算法逻辑背后的权力意志,彰显了资本的剥削本质。

三、规制方向: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路径

马克思在讨论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时明确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15]723} 与此同理,问题的关键并非数字技术自身,而在于它处于何种社会关系之中。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卓著,令全球瞩目。在数字化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历经了从萌生、成长至成熟的探索进程,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当前,中国的数字社会主义发展尚有巨大空间,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唯有清晰地认识问题、正视问题并妥善处理问题,才能更好地彰显数字技术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相容性,使其成为社会发展的真正推动力。纵览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现状,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束缚,数字技术逐渐偏离其本真价值,被资本所左右。马克思早已告诫我们,要破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困境,最根本的是要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然而,世界发展的客观现状表明,当前的资本主义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且曲折的发展过程。脱离客观实际而空谈如何消灭资本主义,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资本主义尚未完全丧失其合法性之时,高呼消灭资本主义只是无法实现的空谈。但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是必然趋势,共产主义的到来亦是必然。在当下数字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情形下,正确识别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变化,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规范引导数字资本的发展,坚持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探寻其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重大意义。

(一) 规避数字技术错位生长的风险

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引发了社会的全面转型。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人类步入了数字文明的新纪元,以数字平台为基础构建的新生产模式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分工和劳动方式。数字化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同时也为劳动者提供了解放双手的新途

径。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数字技术所蕴含的生产潜力无疑是巨大的。然而,正如马克思对机器的分析所示,在认识到数字技术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其中潜藏的危机,并努力避免其负面影响。马克思在肯定以机器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对人类的压迫技术发展带来了机器,却“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技术进步带来了智慧,却“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5]159}。以大机器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本应成为社会发展的加速器,但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下,却变成了阻碍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力量。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所处的生产关系。

如今,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特殊的生产方式,数字技术与数字资本相互结合。在资本统治下,数字技术面临被滥用和误用的风险,存在技术错位生长的威胁。判断一项技术是否存在价值错位,唯一的标准只能是其是否有利于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既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助力,也有可能沦为资本主义深度剥削的帮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妥善利用它。从科学技术诞生与演化的角度来看,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在技术研发及后续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资本与技术完全分离是难以实现的。然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又要求科学技术不能仅仅为了资本增殖而存在。若资本增殖成为技术发展的唯一目的,那么人类社会必将陷入畸形运作的困境而无法自拔。资本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为我们正确认识并进一步规避数字技术错位生长的风险提供了思路。摆脱数字技术错位生长困境的根本措施在于对资本进行规制,科学把握技术与资本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较为完善的关于资本发展和使用的规范,将科技从资本逻辑下解放出来,使其真正成为为人类谋福祉的工具。

(二) 限制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资本作为一种关键的生产要素,其技术赋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引发了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数字资本的合理利用,并引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方向前进。在如何认识和利用数字资本的问题上,中国通过实际行动为全球提供了智慧和范例。2024年4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对资本发展提出总体要求，“坚守资本市场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以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为重点，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作用，推进金融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大局。”^[16]该意见旨在推动资本高质量发展，为更好地规范资本和激发资本活力指明了方向。

首先，需要为数字资本设置“红绿灯”。“红灯”意味着要坚守资本扩张的边界与底线。逐利乃资本之天性，若不加规制，其天性决定了资本必然会竭力获取剩余价值，甚至不惜逾越法律与道德底线。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更好发展，必须对资本予以相应规制。例如，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公众切身利益的行业及领域，要严格整治并处理过往出现的不良因素，在科学谋划的同时辅以具有威慑力的处罚措施，构建起立体化、全方位的资本约束体系。

“绿灯”是指要充分重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引导资本在合理范围内加快流动速度、拓展流通范围，以资本的“活水”提升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引导资本流向有助于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增进民生福祉的行业和领域，如重大科技攻关与国家战略性经济领域等，充分发挥资本促进发展的强大能力。

其次，要制定完善的反垄断措施，严厉惩处不正当竞争行为。数字技术与资本的结合，使得当下的垄断与竞争呈现出形式多样、手段隐蔽等显著特征。必须根据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细化反垄断工作，加强对平台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对大型平台企业“掐尖式”并购行为进行约束，以保障中小企业利益，增强社会创新活力。针对数字平台企业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数据等技术手段实施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要持续加强对算法和数据的治理，提升对此类不正当行为的鉴别能力，并进行相应的监管和处罚。

(三)推动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

面对全球性的数字化浪潮，理解数字全球化的深层含义以及如何引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前进，已成为数字时代的世界之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5年，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倡议。随后，经过学术界的深入研究和拓展，逐渐形成了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扩展到了数字领域。2021年12月，世界数字经济论坛首次大使联席会议在北京举行，深入研讨“共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倡议”。在数字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当下，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为当前不合理的国际数字格局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而且也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途径。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需要全球人民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首先，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规范是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基石。各国基于自身利益，在数据资源控制、数字货币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追求利益最大化。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现实，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确保竞争行为保持在合理、合法、正当的范围内显得尤为重要。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制定治理规范的同时，引导各方认识到合作共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促使他们摒弃“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寻求合作机会，共同推动全球的繁荣发展。

其次，坚持数字多边主义是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这包括推动全球数据资源的共享，深化全球数字经济合作，完善数字转型、数字产业安全等关键领域的多边合作机制，开展有目标、有价值的全球协作，确保数字科技的发展成果能够惠及全人类。

最后，积极构建数字技术国际合作平台是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而其创新与发展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本投入。在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今天，建立数字技术合作的国际平台成为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必要行动。然而，在深化合作的同时，也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原则，建立数字安全保障体系，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民生福祉的关键领域保持警惕，不可有丝毫松懈。

四、结 语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乃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一定阶段的必然呈现。通过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矛盾的深入剖析可知，数字资本主义并未超越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本文以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现状为切入点，对数据商品进行解读，并对人们的生活现状予以反思。通过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考察，阐明资本是如何通过控制社会再生产活动来实现对人的控制，并尝试对其内在机理展开探究。在中国数字社会建设过程中，应积极汲取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正确理解技术与资本之间的辩证关系，促使二者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进而推动构建数字

命运共同体。在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中,本文从一般概念着手进行探索,然而在对其展开抽象批判方面仍稍显不足,语言体系的变革以及观念层面的批判尚未触及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机理。为了更好地研究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点。唯有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入手,方能理解并解决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问题。

参考文献:

- [1] 席勒. 数字资本主义[M]. 杨立平,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
- [2] 闫培宇. 资本逻辑是如何数字化的?: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变革及其批判[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24,46(4):92-99.
- [3] 夏巍,胡运海. 消费盲从、生活附魅与精神虚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三重“异化”[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18-24.
- [4] 蓝江. 数据一流量、平台与数字生态:当代平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J]. 国外理论动态,2022(1):106-115.
- [5] 李巧巧. 数字劳动中的资本逻辑与异化扬弃[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0(4):114-125.
- [6] 蓝江.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哲学反思[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3.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9.
- [8] 杨辉. 马克思类哲学视域下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批判[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45(2):72-79.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7.
- [10] 波斯特. 信息方式[M]. 范静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35.
- [11] 库克里奇. 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J]. 姚建华,倪安妮,译. 开放时代,2018(6):196-206.
- [12]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2.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4] 李素琴.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及其当代阐释力:基于数字资本主义的考察[J]. 思想教育研究,2023(9):43-51.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4(12):11-14.

(责任编辑:陈丽琼)